

環滁山記 瑣憶雜記

者瑯琊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洩出于兩峰
之間者釀泉也峰回路轉有壑壑臨著東上者醉翁
亭也作亭者推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推太守自謂也
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
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
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岩穴
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
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
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于負者歌

琐记杂忆

蔡玉麟 著

自序

今天，这本小册子和大家见面了。

小册子里的文章，大多是我从1980年开始从事莆田文史资料写作中选出来的，有不少还是经过补充和修改的，或能作为地方史料的一点点补充。

《解放前涵江镇商业概况》、《解放前涵江镇工业概况》等4篇文章，是我从1984年征集和出版莆田文史资料工商专辑时，就开始进行搜集的。在访问中，有10多位还是当时主要行业较大商号的当事人，算得上是第一手的资料。

莆田县的教育事业的确是比较发达的，不仅在宋、明两代，科举甲于八闽；就是在近代和现代，特别是中学生和留学生人数之多，以一个县来说，也是可以甲于八闽的。从《20世纪前半世纪莆田县的教育事业》一文中，可以看出当时全县教育的整个面貌；还有《在原省立莆田高中部三年求学的回忆》等3篇文章，也是从侧面来记述当时教育发展的概况。

198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我特地对原在国民党军队中为国捐躯的莆田籍军官的事迹进行征集，访问了他们的家属、同学、同事，先后达20多人，写成《莆田县在抗战中为国捐躯的国民党军官简介》。

199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我在原有莆田文史资

料辛亥革命专辑的基础上，经过的多方的访问和搜集，进行了一些的补充和修改，写成《莆田县辛亥革命人物小传》。

对一些志书和史料有差错的地方，我亦以亲身的经历，写有《郭沫若来莆的日期》、《解放后莆田县第一次区一级建制的回忆》、《莆田县革委会成立前后的几点回忆》等文章，作了必要的纠正。

在1980至1984年期间，经历过清末和民国两个时期的社会上各界人士，健在的人还有。我就趁着这个机会，向他们进行采访，有的还是当时的当事人，写有《保定军校莆人毕业生简况表》、《民国时期莆人任县长简况表》、《民国时期莆田县历任县长（知事）简况表》等4篇文章，亦算是保存了一些资料。

从1980至2001年，我在从事莆田文史资料工作中，的确是得到历届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的关心和支持，写成的《怀念为莆田文史资料撰稿的已故作者》一文，以寄托我的怀念心情，并表感谢之意。

本文虽曰自序，实际上只能算是一篇前言吧！

2002年中秋于涵江紫璜南麓

目 录

序	(1)
解放前涵江镇商业概况	(1)
解放前涵江镇手工业概况	(66)
解放前涵江镇工业概况	(81)
记兴化商帮在福州的“四大金刚” 附：兴化商帮在福州 经营的主要行业	(101)
清末至民国期间三江口港的入超概况	(118)
莆田县辛亥革命人物小传	(120)
莆田县在抗战中为国捐躯的国民党军官简介	(142)
民国时期莆人任外交官事迹简述	(149)
20世纪前半辈子莆田县的教育事业	(152)
解放前涵江镇各小学概述	(160)
抗日战争期间在原涵中三年求学的琐忆	(169)
在原省立莆中高中部三年求学的回忆	(178)
莆田置县的时间	(186)
莆田县纂修方志目录	(188)
南北两洋话龙舟	(197)
莆田县岁时习俗琐谈	(202)
解放后莆田县第一次区一级建制的回忆	(216)
莆田县土地改革运动	(221)
解放后涵江区境内村一级行政区划调整的经过	(231)

目 录

回忆任华同志在莆田任职期间的二三事·····	(235)
忆老县长原鲁山二三事·····	(238)
记侨胞刘吓毡回乡观感·····	(244)
莆田县革委会成立前后的几点回忆·····	(247)
下放小记·····	(250)
杂交晚稻短秧龄育秧试验的调查·····	(261)
政协莆田县第五届委员会工作纪实·····	(263)
莆人迁入浙江省玉环和青田县的调查·····	(273)
莆田县有关抗日战争资料的介绍(讲话稿)·····	(277)
从事莆田文史资料工作的忆述·····	(283)
怀念为《莆田文史资料》撰稿的已故作者·····	(290)
《莆田科普》小报记略·····	(303)
史料五则·····	(305)
保定军官学校莆人毕业生简况表·····	(310)
民国时期莆人任县长简况表·····	(313)
民国时期莆田县历任县长(知事)简况表·····	(318)
附录：(一)发表文章篇名、刊物、出版单位·····	(323)
(二)编写书名、出版单位、日期·····	(333)

解放前涵江镇商业概况

解放前，莆田县涵江镇因外有天然良港三江口，又处在河海交汇和福厦公路的中心，所以，不仅是全县商业的中心，也是闽中一带商业的中心。

全镇开设的各种行业，达到四五十个，如加上手工业、工业，可达到八十个左右。

据有关资料记载：明嘉靖年间，倭寇祸莆后，莆田县的商业中心，即由黄石迁移至涵江。在姚旅《露书》中，对涵江商业和航运的情况，已有明确的记载。

清初“截界”后，沿海的商人又多迁移至涵江一带，也促进了涵江商业和航运的发展。这在涵江《苏氏族谱》、澄渚《俞氏族谱》中，也有具体的记载。

至清中叶，涵江镇的商业和航运有了更大的发展，如顶铺徐街的徐家，霞徐大宫前的刘家，后坡李街的李家，苍然的东山陈家，宫下荔枝埕的吕家和林家，楼下卢埕的杨家等，都是因经商和航海而发家致富的，并还有“徐百万”、“刘百万”、“李百万”等之称。

清末，由于轮船航运之兴起，莆田和仙游两县盛产的“兴化桂元”、“兴化赤砂（赤砂糖）”，大量的运出，故在上海、宁波、江浙直至北方地方，开设桂元行的也逐渐增加，并有“无兴（化）不成镇”之美誉，当然，这也直接或

间接促进了涵江商业的发展。

民国期间，随着时代的前进，全镇的商业，特别是较大的行业，也逐渐向规模较大、资金更集中等方面发展，有的第一家资金达到银元二三十万元，有的雇工达 20 多人。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抗日战争爆发后，福建省沿海各港口，悉被日本侵略军所占据或封锁，只有三江口港继续与上海通航，故一跃而成为全省甚至东南半壁唯一的一个吞吐港口，真是万商云集，涵江的商业也空前繁荣，故曾一度有“小上海”之称。

在这四五十个行业中，以豆饼、桂元、纱布、京果、轮船这 5 个行业，在经营规模和经济实力等，均居各行业之首，故俗有“豆、桂、布、京、轮”之称。其他的行业有：食糖、百货、中药、西药、鱼行、代理商、酱园、糕饼、鞋业、金铺、侨汇、箩篾、木材、文具、瓷器、颜料、饮食、照相、电影、茶叶、苎麻、灯笼、汽灯、香烛、烟丝、冥楮、钱摊、当押、戏馆、戏帽、古董、大米、鱼类、青果、猪肉、蔬菜、陶器、柴炭、石炭、砖瓦、棺材等，现将其经营情况，分述于下。

豆 饼

豆饼是涵江镇商业四五十个行业中最大的一个行业，开设的先后共有 40 多家，其分布的地点，以宫口街（宫口河）两岸为主的，有泉美、通美、瑞昌、协丰、慎昌、振丰、穗丰、大成、鸿隆、福同昌、永美、日升、恒盛、阮记、通

和、聚生、德聚、振记、丰盛、丰泰、元通、万生、珍记等家；在相邻桥兜、林墩的，有大川、大华、大山、大升、瑞记、乾记、美记、通记等家。

在木帆船时代，各商店所经营的豆饼，多是向福州商人转买的，即购买船上一部分的原货，运到三江口港来，叫做“起原船”。

进入了轮船时代，他们则逐渐联合起来，直接向上海和东北购买，故有以陈镜平（湖泉）、陈镜鸿（济州二）兄弟为首的泉美、通美帮；以吴捷山（杰十九）为首的瑞昌帮；以杨元高（杨九三）为首的协丰帮；以黄玉璜（潘侯）为首的振昌帮。

豆饼业进港的物货，除豆饼外，还有面粉、米碎、大米、大豆、花生油、豆油等，一般占到三江口进港总吨量的一半左右，因此，对当时整个涵江的商业来说，的确是可以举足轻重的。

由上海和东北运进的豆饼，前者每块四十七八斤（市斤，下同），后者每块五十二斤，每块值银元2元多。上海的豆饼，因路程较近，饼质新鲜，又是沿海农民喂猪的好饲料。

豆饼的运进，以20世纪20～30年代为最多，因当时莆田和仙游两县大量种植罂粟（鸦片），需用的肥料也多。1925年（民国14年），据《衡报》的登载是120万块；1931年，据有关资料的记载是40多万块，另一说是70万块；以后，因肥田粉的大量上市，就逐渐降至二三十万块了。

面粉是从上海加工后运进的，每年10万包左右，每包四

十三四斤，多用作民间婚丧喜庆和菩萨诞辰等之用。

米碎是从泰国、越南运进，并由厦门转港的，数量比较多，因每百斤价格比当地大米便宜5角左右，故多用于制作“兴化米粉”。

大米是从缅甸仰光运进，也是由厦门转港的，数量比较少，一般是荒年多一些，正常年景则少一些。

大豆也有两种：一种是从大连运进的，每袋一百七八十斤，豆色好，杂质少，可供制作豆腐之用，每百斤值银元5元左右；另一种是从上海运进的，多为江西和安徽两省所产的，俗称“车豆”，每袋150多斤，因杂质多，只能用于制作酱油，每百斤价格比前者便宜一元左右。

桂 元

桂元是涵江镇仅次于豆饼业第二大的一个行业，经营的特点，一般都没有专门像样的商店，只有焙制的焙房和一些场所。开设的地点，除镇内较偏僻的霞徐、保尾等地外，多是分布在桂元（龙眼）主产区华亭、西天尾、梧塘、江口等地的农村。

莆田和仙游两县因盛产桂元，所焙制的“兴化桂元”，早已驰名全国。每年所产的鲜果，大年有40多万至50万担，小年只有一半；所焙制的兴化桂元，大年有十六七万担，小年只有8万担左右。两县的比例，莆田占70~80%，仙游占20~30%。

当时，焙制兴化桂元的，有“二盘商”和“顶盘商”两种：二盘商，是仙游和华亭一带的商人和农民，因经济实力较差，只将所产或购买的桂元，焙成半成品，俗称“千元”，卖给涵江和平原一带的商人，获利较少；顶盘商，是涵江和平原一带的商人，因经济实力较强，购买千元后，再焙成兴化桂元，运往外地出售，获利较多。

桂元的品种，适合于焙制的，主要的有大度本、下路岭、乌龙岭，还有本树本、寮本等。颗粒一定要大，以大取胜；肉要厚，表面作绉纱状，色如漆而有光泽，像子鱼嘴那样红润；壳厚，反而不易破碎。

在木帆船时代，兴化桂元的运出，除木帆船外，还多挑运至永泰县大樟溪，顺流至福州，再海运至浙江省；也有直接挑运至浙江金华一带的，俗称“走浙江”。

进入了轮船时代，则多集中在涵江，由三江口港运至上海、宁波、温州、福州等地，其比例是：上海占70%左右，宁波占20%左右。

每年“白露”以后，焙房内外，箩、筛、箱、袋等为之充塞，真是浓烟与灰雾齐飞，箩声共筛声不绝，好一片繁忙的景象！因桂元行的老板都在想赶“头水”（第一批运出）：一是新货上市，销路快，资金容易周转；二是新的干果，水分含量多一些，能多赚一些钱。以后，还有“二水”、“三水”。

兴化桂元都是用四方形的木箱装运的，四周和上下都围以竹叶，以防潮湿。因所装规格的不同，故每箱的重量也不

一样，如“桶全”是50斤，“正貳”、“副貳”是60斤，“板正三”是100斤。每担价格值银元十一二元，可换稻谷两三担。

兴化桂元的销路较广，在上海、宁波、南京、苏州、嘉兴、镇江、杭州、温州、金华、兰溪、湖南、芜湖等地，都有莆仙人开设的桂圆行。在上海的先后有捷春，义泰、立春、福生、万和、德丰、锦昌、元成等四五十家，其中，以捷春为开盘行，当地中医开处方用兴化桂圆时，只写捷春丸几粒；在宁波的先后有义兴、瑞裕、南昌、东昌、大昌、安记等二三十家，其中，先以义兴为开盘行，后为南昌桂圆行；在南京的先后有万大、华大、志成、天成、义丰、建兴等24家；在苏州的先后有鸿兴（卢富茂）、义大、美丰等家；在杭州的先后有三星、捷泰等家；在湖南浏阳的先后有蔡大生等四五家。

纱 布

纱布是涵江镇仅次于豆饼、桂圆一个主要的行业，全镇开设的商店，先后共有40家左右，其中，经营批发的有八九家，零售的有三十二三家，多分布在最繁华的孝义、衙前街、市顶、三角埕等一带。

主要的品种：从上海运进的有男女线呢（俗称中山布）、花哔吱、洋布花、漂白布、龙头细布、次斜、元色哔吱、元色斜纹等，从南通运进的有土布、男女线呢等，从杭州、绍兴、盛泽运进的有丝绸之类，从广东运进的有香云纱

等，从厦门运进的有日本和香港的正哔吱、华达呢、贡呢、印度绸等，从福州运进的有土织的男女线呢、格布、条布、土纱等，还有本地西洙、南埕、后黄等村加工的土布等。

经营批发的，较早的有仁昌绸布庄，其经营的规模，曾居同行业之首。接着，又有以徐启燕三兄弟与人合股的双茂隆批发行之兴起，经济实力甚为雄厚，年销各种纱布达10万匹，一跃而为镇内之一大巨商。抗日战争期间，茂隆、芳来、茂兴等3家，均因经济实力上升，旗鼓相当，遂形成鼎足而立之势。抗日战争胜利后，茂隆布行周文开、文谊、文铁三兄弟分驻上海、福州、涵江三地，因能注重信誉，加上经营有方，业务日益发达，故能长期执全行业之牛耳，直至解放时。

经营零售的，前期以双茂、大方等家为全行业中之佼佼者。后起之秀的大达一家，因股东能同心协力，一跃而居全行业之首，亦直至解放时。

解放前夕，纱布中的“金莲妙舞”哔吱和“金杯”元斜，曾一度像黄金、大米一样，亦作为市场上，特别是“买空卖空”的“货币”，进行流通。

京 果

京果是涵江镇的五大行业之一，全镇开设的商店，先后共有三十二三家，其中，经营批发和批零兼售的有10家左右，零售的有20家左右。因经营的多是群众日常生活所必需的副食品和用品，故分布的地点，不仅最繁华的街道有，偏

僻的小街大巷也有。

经营这个行业的商店，多挂有“山珍海错，南北京果”等八个字，故又称南北京果店，俗称“杂货店”。

主要的品种：山珍的有香蕈、红蕈、木耳、笋干、发菜、茶叶、山果品等，海错的有海参、干贝、鲍鱼、鱼翅、毛茛、紫菜、虾肉、蚶干、蛏干、目鱼、鱿鱼、鱼鲞、海带等，还有芡实、乌枣、红枣、南枣、蜜枣、莲子、胡桃、黄花菜、瓜只、粉丝、榨菜、八角（茴香）、花椒、白果核（银杏）、皮蛋、豆腐乳等，本地的有桂圆干、荔枝干、柿饼、李干、咸橄榄、菜脯丝、菜脯角（萝卜）、豆腐支、罐头、炼乳、食糖、油类、花生、米粉、线面、糯米、绿豆、淀粉（粉心）等，日用品有煤油、肥皂、鞭炮、火柴、长连纸、市挂纸等。

经营批发的，较早的以义裕一家为主，接着，以郭文楸（松岩、四八）开设的八达（与南通前后相连）和江祖筵（兰皋、江春霖第四儿子）开设的豫大（正大）规模最大，批发的范围，除莆田县各地外，还销至仙游、福清、惠安等县。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又有苏承棋开设的承源之兴起，并能长期执全行业之牛耳，直至解放时。批零兼售的，有美盛（义大）、德泰、益大、宏兴、集春、慎记、义记、同生、集生等家。

经营零售的，抗日战争前，亦以郭文楸开设的南通一家规模为最大，每日营业额达银元五六百元。其他的有义美、信裕、义昌、协利、顺兴、天和（义山）、义隆、万兴、晋昌、胜昌、万裕、胜春、万和、同姓等家。

经营零售的生意，如遇到富豪人家的婚丧喜庆之事，有的一单就是银元几十元甚至上百元；如是卖肥皂或火柴，一笔只是一两角或几分钱。在抗日战争前，因货币比较稳定，大户人家购买的东西，都是挂欠的，等到“尾牙”过后，由商家“放单”收账，如能在年关前还清，算是注重信誉的，明年可以再挂欠。

经营这个行业，和气候的变化关系极大，不仅要注意到本地气候的变化，还要注意到外地气候的变化。因气候一变化，就会影响到某一产品的产量，故要及时进行定购和采购，以保证有足够的货源。

同时，还要注意到产品的保管，如遇到潮湿的天气，什么产品要存放在什么地方，要用什么工具进行存放，才能不受损失或减少损失。如茭实一项，如能保管得好，往往可以获利两三倍，否则，甚至发生了亏本。

轮 船

早在木帆船时代，涵江镇就有“船头栈”的设立。

1912年（民国元年），大同桂元行黄尔顺（土名二孙），首先集资在上海开设福兴轮船公司，购入国民号轮船一艘，开辟了三江口港至上海的航线，虽因受骗上当而告破产，但仍不失为莆人经营轮船业之先声。

接着，先后开设的有：黄献武的义泰轮船行，方家明与人合股的鲲南轮局，黄星甫、黄星阁兄弟的恒生轮局，黄祖修与人合股的华新轮局。不久，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也都先

后停业了。

从1920年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原鲲南轮局重新集资，再整旗鼓，由郑锦树（鲲南树）负责经营；康秋涛又与人合股开设涵兴轮局，退出后，又独资开设福生（福申）船务行；涵兴轮局也因股东更动，重新改组为大兴轮船公司。从此，鲲南、福生、大兴等3家，因各拥有一定的客户和货源，遂形成鼎足而立之局面。

1931年，据有关资料的统计，进港的大小轮船有320多艘，吨位最大的为4820吨，最小的只30多吨。

抗日战争爆发后，福建沿海的港口，悉被日本侵略军所占据或封锁，三江口港至上海的航运，也曾一度中断。但船务行为了谋求生计，遂租用外国的轮船进行行驶，开始是试探性的，以后，也就逐渐增加了，其中，主要的有神佑、神福、神爱、神华、神光号轮船，时称为“五神”。

这里，引述1961年新编《莆田县志·莆田商业》（草稿）中的一段记载：“抗战事起，敌人封锁港口，而英、美商船，通航如故。敌人所布置的水雷（指三江口港），被沿海村人，捞起殆尽。1938年，汕头失陷以后，中外通商，只有涵江一口，百货堆积，殆无余地可容……涵市贸易之盛，侔于上海，涵商致富，又十倍于前。”从这一段的记载，可以看出当时涵江贸易之盛况，因而一度有“小上海”之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轮船亦不能行驶，只好租用德国轮船进行行驶。但在租用德国茂福号轮船行驶中，亦遭到日军的劫持，涵江商人损失至巨，从此，三江口港至上海的航运，乃告全面中断。

抗日战争胜利后，三江口港至上海的轮船又恢复正常的行驶。各船务行亦纷纷继续经营业务，其中，经营规模较大的福中与大东船务行，又形成对峙之局面。1948年秋，因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已开始全面崩溃，船务行的业务，也日益萧条，一直至解放时。

据1946年4月至1947年3月有关资料的统计，进港的大小轮船有240多艘。

三江口港至上海的航运，一般都以货运为主，也有运载一些旅客。当时，为了优待学生起见，形成了“来三去四”的惯例，即去时，每人4元，比旅客便宜1元；回来时，因学生身边剩钱无多，故只收3元。

另外，有黄琴亭开设的华安胜记船务行，首先开辟三江口港至福州（兼营厦门、温州）的航运，先后达20多年。后又有郑五十枯与人合股开设的同益船务行之兴起，因各拥有30～50吨的轮船两三艘，终成秋色平分之局面。

全镇开设的船务行，除上述几大家外，先后还有捷大、华兴、光大、河海等家，分布的地点，多集中在陡门头靠海的两岸。

食 糖

从三江口港运出主要的货物，除兴化桂元外，要算是“兴化赤砂”了。

全镇开设的商店，先后共有17家左右，其中，仙游人经营的有十一二家，莆田人经营的有五六家，分布的地点，以宫口街两岸为主，在陡门头和延宁后沟也各有3家。